



蜻蜓丛书·文化与社会·郑天一主编

生育与村落文化



作者依据在浙江、山西实地考

察和对北京自愿不育者的调查，描

述了中国生育文化的现状和渊源；

提出解释中国人生育动力的新理论

——关于村落和村落生育文化的概

念和理论，分析了中国人生育的物

质与精神的动机，对生育的

抑制力量；探讨了对中国传统

李银河著

生育文化加以改造的可能性。

蜻蜓丛书——文化与社会

生育与村落文化

李银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育与村落文化 / 李银河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5

(蜻蜓丛书: 文化与社会)

ISBN 7-5004-1453-6

I. 生…

II. 李…

III. ①文化社会学 ②生育—文化—研究—中国

IV. C924.2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怀柔中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1

字数: 180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6.50 元

前 言

这本讨论生育文化的书，原本不在我的研究兴趣之内。回国后，我一直在做婚姻、性爱方面的题目，这主要是因为我喜欢较小的、容易掌握的题目，不喜欢那些没有研究条件、没有研究手段、也无法界定范围的大题目，因此就很少涉及国计民生。最近经过反省，想到学者的公民义务，开始朝这个方面努力。然而我至今仍认为，学者的主要任务，是尽自己在学术上的本份。把自己兴趣内的题目做好才是本份，虽然我们也不能拒绝尽义务。

现在在中国出版的每一本有关生育文化的书，都要在两个人的研究之外找到它的位置。其一是贝克尔（G.S. Becker）的人口经济学，这是因为中国的学者应该把自己看成世界学术大家庭的一分子。其二是费孝通对生育制度、生育文化的讨论，这是因为我们必须尊重学术传统。假如别的人可以不必提的话，那么提到这两位实在是必不可少的。贝克尔把生育行为纳入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在这个领域里建立了精确的数学模型；而费孝通把人们的生育动力归结于制度的力量，并且总结出中国人

生活方式中与欧美人不同的一面（接力模式与反哺模式），由此论到了中国人对待生育的态度为什么与英美人有很大的不同。这两位卓越的学者一位是经济学家，一位是社会学家，都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不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在解释现实、预测未来方面都面临同样的任务。费孝通研究生育问题，面对着半个世纪前的中国社会；贝氏研究人口问题，面对着当代北美社会。但是两人的研究都涉及了生育的动机。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当代中国社会。如果需要指出本书的位置，就让我们从这里开始。

贝克尔指出，假如人们可以自由的决定生育几个孩子的话，假如新生一个孩子的边际成本是正值的话，就可以视孩子为耐用消费品；反之，则可视孩子为耐用生产品。这一点作为经济学上的定义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种论断的意义不在于它在逻辑上的完备，而在于它对现实是否有说明意义。贝氏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它对西方社会中生育行为做出了良好的解释。相反，如果某种论断仅仅在逻辑上是完备的，却与现实相去甚远，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打个比方说，假设我是个人本位的西方社会中人，在此情况下，我的收入超过支出，我对我自己就是耐用生产品；支出超过收入（假设我有很多积蓄），我对我自己就是耐用消费品。这在逻辑上也是完备的，但是没什么实际意义，因为很少有人仅仅因为人不抵出就自杀。但是的确有人因为孩子的边际成本太大就不生孩子。这个例子说明，经济学的度量虽然可以用到个人生活的领域，但还是有一定的限度。在西方社会里孩子可以是消费品或是生产品，但把配偶说成生产品或消费品就不一定有意义。倘若更进一步，用之于自己，就绝对是错的了。这是因为在那个社会里，也没有人肯把自己和别的东西来交

换，除非确知本人已病入膏肓，肯定没有几天活头了。假如以上论述是正确的话，那么想把贝克尔的理论用之于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农村，就千万要谨慎。在这里很多人把生育起码一个男孩子看成是自我的延续，决不肯交换，何况政府也拿不出什么与农民来交换。

费孝通的理论指出了在中国社会里，有尊老的传统和儿子养老子的现实，他把这种现象归因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在五六十年前肯定是很普遍的现象，而在现实的社会里，反例就太多了。不但在城市，就是在富裕的农村，反哺模式也已很难用来概括现实情况的全部。我此次在浙江调查，就发现在富裕农民中间，父辈养育子女的费用已经大大超过子辈对父辈的扶养。但是费孝通在这一点上是对的：中国农民对生育的态度，确实与西方人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一种文化的差异。然而，容易被人们忽略的一个事实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农民的生育态度和城市居民的生育态度也有了很大的差异。究其原因，生育文化的源头似乎不在全民族的文化传统之内，而在具体生活环境之中。

在谈到我自己的观点之前，首先要谈到我对前辈学者的尊敬。我认为，作为一个社会学的后来者，没有什么比向前辈学人学习更重要的了。而比之于学习他们的方法、理论，学习他们的风范、尊严就更为重要。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当年说：科学就是对现实存在的力量的实事求是。这也是我的信条。从这个立场出发，我认为贝克尔的人口经济学在中国的农村是不适用的，因为它缺少在这里适用的基本条件；在城市里有一些适用的例子，但不是普遍现象。不管怎么说，中国对于贝氏来说，是十分遥远的一隅，在他构造人口的数学模型时，没有必要把这里考虑在

内。相比之下，费孝通的若干论述更接近中国的现实。但是他对中国人生育文化的解释，在今天看来就未必依然适用了。因为我发现，就算现在中国农民晚年的生活不依赖于反哺，生育的欲望也未必改变，情况似乎要复杂得多。虽然这两位大师的论断对于现在中国农村的生育情形未必是好的概括，但是他们的工作依然使我受益；同时也告诉我，针对要说明的问题直接去做实地工作，比之追求研究方法的精微奥妙和掌握更多的文献，有时更能解决问题。

我在这本书里谈到的现象是文化人类学的理想研究对象。中国人生育文化的内容，有好多在文化人类学的教科书之内。文化人类学指出，公众中存在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在城市里做自愿不育者的调查时，那些人谈到农村人抵死要生时，无不切齿痛恨；在农村提到城里有自愿不育者时，农民说他们必然是有病，身体有病或精神有病，两者必居其一。生育行为和文化差异的概念产生了联系，就不再是经济学的理想题目。在为本书做文献准备时，曾经参阅了一些近年来发表的国内学者的论文。有位同仁把贝克尔的理论移植到中国，并建议把抵死要生孩子的人生下一个孩子的边际成本算作负无穷大——仿佛人家生了这个孩子之后会立地成为亿万富翁。我认为这样的算法不但不真实，而且是拿穷人开心。贝克尔理论的价值，在我看来主要不在于它的精密性 (reliability)，而在于它对于西方社会描述的正确性 (validity)，但是把它的概念用于中国的农村，就是错误的了。一种理论假如是错误的，那么它的精密性越高，就越是害人。故而在科学上，我们应该首先追求正确，然后尽力去达到精密。马林诺夫斯基所指出的实事求是原则，实在不该被忘记。既然经济学的度量不成功，那么用社会学或人类学手

段来研究生育问题就是必不可少的。虽然社会学和人类学在精密性方面，尚不能达到西方数量经济学的水平，但是在这个领域之内却是更加可靠。

文化人类学把价值观看成一个文化的核心部分。生育的观念在中国农民的价值观中，又占很重要的地位。很显然，农民和住在城里的人在生育观方面，有本质的差异。像这样的文化差异例子在人类学经典著作里讲得很多。但是这种现象依然使我诧异，因为在经典著作中，这样大的差异存在于萨摩亚的岛民和纽约的市民之间，所以多少可说是自然形成的，在我们这里则不然。人类学的经典著作认为，对个人来说，价值观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但有一个价值观突变的例子，是我亲身经历的，至今记忆犹新：在文化革命里，成千上万的青年自愿奔赴边疆，并且把这视为一种极大的幸福；过了若干年，这些人又把回城看作是最大的幸福。一旦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自己都觉得变成了另一个人。当年我是一个知识青年，现在是一个自愿不育者。假如我没有回城，而是继续在农村当农民的话，很可能也会把生育起码一个男孩子看做金科玉律——当然，那个抵死要生男孩子的我，就非今日的我可以理解。这说明在我们的国家里，文化差异就在我们的身边，只不过我们视而不见罢了。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发现文化差异时还有一种特殊的困难，就是这里有一种受到提倡的价值观。举例言之，提倡人只过异性间的婚后的性生活，那么除此之外的一切行为都属性罪错；而向往性罪错的想法，都属邪念。在生育方面，也提倡大家按国家、民族的需要去考虑生几个孩子。虽未见到生育罪错和生育邪念的提法，但是实际上用的词汇意思也差不了好多。尽管被提倡的价值观是好的，但假如以此为准

绳，不承认有文化差异，而是说有的地方好，罪错和邪念少；有的地方坏，罪错和邪念多，那么人类学就可以取消了，只须伦理即可。我本人前一段在作婚姻与性爱的研究时，因为没有使用罪错和邪念之类的词语（这只是出于职业习惯），已经被一些人指为犯下了学术罪错。这纯粹是因为误会——我以为提倡是宣传部门的工作，科学研究以发明发现为主，完全是另有所司。

在我们国家里，还有一些人认为发现是自然科学的任务，社会科学的任务是提倡。这种观点的实质是不相信社会科学能够解决实际问题。遥想欧洲中世纪，教庭也不相信自然科学能解决问题，所以总要把有所发现的科学家烧死，留着专事提倡的科学家。数百年后，自然科学解决了问题，教庭也感到后悔。现在社会科学能不能解决问题，尚在未定之天。但是我们学科的奠基人断言“科学可以解决问题”。既然如此，何不让我们试试？

在生育文化问题上我还要斗胆申辩几句：只要你把人家招了工，就能根除罪错和邪念；而把你的亲生儿女送到罪错和邪念丛生的地方，永远不让他们回来，他们也会充满邪念。当然，这并非一个认真的建议，而是要说明，文化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某些人主张提倡出来的，对其不该妄做价值评判。

本书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有三个来源：在浙江南阳村、山西南山头村所做的调查和对北京自愿不育者及独身者所作的调查。这些调查采用了人类学的方法。前两个调查访问了村子里的农户，尽可能了解了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后一个调查就远没这样彻底，好在对不育者的调查主要是用来参照。有一些结论属于常识的范围，比方说，近二十年来，对

农民生育行为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这种政策对农民来说是严厉的，然而对它我没话可说。试想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到了像中国这样人口密集资源相对缺少的程度，除了选择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就是选择饿殍遍地，暴力横行，幸存者坐等联合国的救济。在这个方面，实在不能存任何一点幻想，故而今天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乃是一种不得已，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另一方面，农民这种身份就会产生渴望多生育的价值观，在近期内指望人家放弃这种价值观是不现实的。所以实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在总体上是合理的。既然是合理的，就不会行不通，不管它是不是强制的。在调查中，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农民对限制生育都是不自愿的，但是他们又都表示这种限制并不是不可接受的。真正不能接受的，是在这件事上不公平。比方说，某些年份不许双女户再生孩子，必须去做绝育手术；另一些年份又许可他们再生个孩子，只要交得出罚款就行。这一改变使已经做了绝育手术的人感到气愤不平。或者干部利用权势多生孩子，假如有了这样的事，计划生育工作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农村独特的文化群体（我称之为村落文化）之内，对于这一类的信息特别敏感。本研究的结论之一就是，在农村要控制人口的增长，除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无路可走。事实上，任何文明国家都要强制公民干一些不自愿的事，比如纳税，守法，战争时期服兵役。在这个方面没有什么可害臊的。可害臊的是在强制时不公平、不合理、遮遮掩掩地保留内幕。实际上像这些行为不单是可羞，而且是有害的。像这样的结论都不超出常识能理解的范围。

一门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当它研究有

成的时候，都会与哲学交界。比如爱因斯坦（A.Einstein）在研究物理有成之后，罗素（B.Russell）在研究作为数学基础的逻辑有成之后，都提出了他们有所依据的哲学。虽然在社会学的奠基人物名录里有好多哲学家的名字，但是却缺少以社会学工作为依据的哲学。费孝通教授对后辈耳提面命时，说过一句带点哲学意味的话：社会学研究要出故事！这也许可以叫作我们的哲学罢。

弗洛伊德（S.Freud）研究心理学有成后，也提出了他的哲学。这种哲学和我们的有点类似。在他看来，一个人自出世以来，通过童年经历，人格逐渐成形；而在我们看来，一个人自出世以来，步入一定的文化圈子，耳濡目染，逐渐形成了他的价值观。这两者的近似之处在于不论人格也好，价值也好，都接近了人的本体。费孝通说要“出故事”，不是说让我们去编些故事出来，而是要我们去研究人与文化的始终，有头有尾地去说明问题，倘若把研究对象弄得支离破碎，就可能误入歧途。人类学叫作“人类学”，自有它的道理。在我们国家里，不是只有一个故事，还有很多的故事没有被发现。这些年我做了独身者、自愿不育者、同性恋者的社会学研究，其本意也在“出故事”。其间常被人讥为鼠肚鸡肠，不会做大题目，在痛心疾首之余，还能坚持做下来，也是因为心中有所坚持。这次做生育的研究，虽然有迫于同行压力的一面，但是结果并不后悔，因为毕竟是有所发现。以前做独身、同性恋的研究，多少还是些老的故事，因为这些研究在国外早有人做过；而这次的研究就是个新的故事了。透过这些故事，我们就能够克服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克服文化差异的壁垒，去了解与自己不同的文化群体及其行为。在这个过程中，至高无上的目标是真实。而恰恰是这一点，

总是被人遗忘。

近来总是有人问我：你的样本有多大？散发了多少问卷？如何取的样？却很少有人问起你是怎样发现有这样的文化群体的，你怎样接近它，怎样从中获得可靠的信息。无论如何，我们的社会还不是那样的透明一致，而各种各样的文化差异，还没有全在我们胸中。在把这些问题搞清之前，企图以调查的规模、数学方法的完备构成恢宏气势去压倒国外同行，恐怕是一种痴心妄想。统计学不能保障研究的真实性，数学也不能保障研究的真实性。能够保障研究真实性的东西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胸中的求知欲望。假如我们相信知识不是恢宏气势，也不是主张提倡，而是有关实际存在的信息，就总能够发现一点东西。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我的丈夫王小波的无私帮助，我们共同讨论了每个章节，每个思想，其中不少最为新颖犀利的思想来自他，对此我深怀掠美之感。此外，宏观分析一节的统计分析及其解释也得益于与他的共同研讨及他在统计学方面的造诣。全书完稿后，又经过他对全文逐字逐句的阅读和修改。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援助，这本书就不可能完成。在沁县调查中，得到了北京大学社会学所付喜国的帮助；在余姚调查中，得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生陈俊杰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意。最后，这项研究得以实施，还要感谢中华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资助。

作者 1993 年
4 月于北京

目 录

一、生育文化类型	1
(一)生育文化的定义	1
(二)生育文化类型	3
(三)我国的三种生育文化类型	11
二、人口学的困境	27
(一)宏观人口学的描述	27
(二)微观人口学的解释	32
(三)农村养育孩子的成本与效用	36
(四)贝克尔理论不适用于中国农村	46
三、村落文化	57
(一)村落文化的定义	57
(二)村落与宗族	65
(三)村落文化如何影响生育行为	69
四、生育的物质动机	85
(一)孩子的直接经济效用	88
(二)孩子的养老保险效用	91
(三)老年自养问题	95
(四)现行赡养法规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105
五、生育的精神动机	112
(一)生育以满足成就感	112
(二)生育以传宗接代	121

(三)生育以满足亲子感情	140
六、生育动力的抑制	142
(一)两大抑制力量	142
(二)宏观分析	151
(三)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	167
七、生育文化的现代化	188
(一)生殖与性	188
(二)传统与现代化	206
(三)传统文化变异的可能性	212
跋	221
附录	225
附录一：余姚马渚八卦坟以来陈氏系谱 ...	225
附录二：计划生育父母养老保险制度	227
附录三：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二胎生育的政策 的暂行规定	229
附录四：计划生育合同书	231
参考书目	237

一、生育文化类型

(一) 生育文化的定义

这是一部关于生育文化的社会学专著。谈到生育，人们马上会想到人口学，但是这部书与人口学著作不同。关于这两类著作的区别，摩尔（W.E.Moore）曾做过明确界定，他说：“一般而言，人口学更关注社会生活中的‘分布’特征，而较少去概括诸如‘文化’、‘社会结构’之类的大概念。”^① 人类毕竟是赋有意志的生物，因此，论及人类的生育，就难以回避生育动机问题；而论及人们为什么要生育，就直接进入了他们对生命的认识这一观念领域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领域，这就涉及了“文化”的概念。本书就是将人们的生育行为作为一种文化来研究的。要研究生育文化，必须首先为它下个定义；而要为生育文化下定义，则必须先为文化下个定义。社会学家和文

① W.E.摩尔：《社会学和人口学》，顾宝昌编《社会人口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5页。

化人类学家已经为文化下过无数的定义。在这些定义中，文化大多被视为一个复杂的总体，它不仅包括那些外在形式，如风俗和法律，也包括那些不易被直接观察到的内在感受，如观念和信仰。在这项研究中，生育文化被定义为人类在生育这一问题上的一整套观念、信仰、风俗、习惯及行为方式。

至于说到作生育文化研究的动机，首先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兴趣，即惊异于文化塑造人类行为的力量。文化最奇妙的力量在于，它能使生活在这个地球某个角落的某一群人以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另一群人眼中变得惊世骇俗；使某一群人以为不可或缺的东西，在另一群人那里变得可有可无。例如在中国，人人都要生儿育女，家家都要传宗接代。不但要生，而且要多生；不但不可不生，而且“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谁也不问为什么是这样，谁也不知为什么要这样，只是感到除此之外似乎别无选择。与此同时，生活在地球另外地方的一些人群中，就有相当大比例的人们终生不育（英美均为15%左右）。笔者无意评判上述两类生育观念和行为方式孰优孰劣，只是怀着敬畏的心情，对文化塑造社会规范和习俗的力量叹为观止。

其次，笔者强烈意识到研究生育文化的实用价值。在目前我国所面临的严重人口压力之下，一切有识之士不能不关注生育问题，而作为社会学者更能感觉到责任之重大。要想改变中国人的生育行为方式，必得首先充分了解他们的行为方式是怎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只有当我们了解到中国人目前的生育行为有哪些特征，了解到有哪些人在拼命想多生孩子、生男孩子，哪些人有节制地生育，哪些人自愿不生育。上述各类人又分别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去多育、少育或

不育时，我们才能谈到如何去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换言之，假定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使中国人选择少育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的手段首先是去了解他们目前为什么要多育，一旦具备了哪些条件；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他们就会从多育变作少育甚至不育，然后尽力去创造这种条件和环境，这样便可达成改变人们生育行为方式的目的。这就是这项研究的应用价值。

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应用方面来看，对生育文化的研究都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的题目。这项研究的意义也就在这里。

（二）生育文化类型

在开始讨论生育文化之前，有必要大致地涉猎一下世界人口发展变化的状况，因为人口状况既是有关生育文化的研究所要提出的主要原因，也是形态各异的生育文化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在影响人口增长的诸因素中，生育是最主要的因素（当然，人口死亡率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因此，生育文化类型虽然与人口状况是互不重迭的两个概念，但二者之间关系紧密。

从生育的角度看，可以将世界上现存的生育类型粗略地划分为两大类，即发达地区的低生育类型和欠发达地区的高生育类型。（见表 1-1）

此外，还有一些生育类型介于这一高一低之间，属于过渡类型。中国目前的出生率就徘徊在 20‰ 上下，应当算是过渡类型。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类型就会发